

流动性迅速增强条件下的社会治理

张康之

摘要:当人类进入新世纪后,我们明显地感受到社会运行加快,社会的流动性处在迅速增强的过程中,这对社会治理形成了极大挑战。虽然我们一直在改革的旗帜下去寻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但是,风险社会及其危机事件频发的现实证明我们在改革方面并未找到着力点,也就是说,我们并未给予社会的流动性以充分的关注,更没有基于社会流动性的现实去规划和设计改革方案。其实,对于改革而言,社会的流动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我们必须在社会治理变革以及新型社会体制的建构中充分考虑社会的流动性。如果说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社会治理行动去做出自觉安排的话,考虑到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维度——社会组织化,改革的重点就应当放在组织模式的重建方面,即建立起合作制组织,并实现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

关键词:流动性;社会治理;全球化、后工业化;合作制组织

作者简介: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2XNL003)。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3969/j. issn. 2095-042X. 2016. 05. 003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一个标志性的社会现象就是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现在,我们似乎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切都在流动,人和物在高速流动之中,人的观念也发生着迅速的变化,而且,人们赖以交往的语言等媒介和工具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让我们体会到了古希腊哲人的断言: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然而,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养成了追求稳定的偏好,面对流动的世界,人们总是希望谋求某种稳定的存在物作为开展社会活动的平台或支撑点。比如,人们可以通过建立起稳定的制度而把一切流动着的社会因素纳入到制度的框架之中来。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无法消除流动性,也总是努力实现对流动性的驾驭和控制,比如,确立起某个稳定的坐标而把流动着的事物放置在这个坐标中去观察,形成控制流动性的措施和方案。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流动性属于一种高频流动,对人们自古以来就拥有的那种寻求稳定性的偏好构成了挑战,以至于此前所拥有的社会秩序正处在即将瓦解的边缘。总的说来,流动性对社会治理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使原先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都不再适应,使人们过往的社会治理经验变得那样的粗浅和微不足道,似乎一个失序的社会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此,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就是风险以及危机事件频发。果真人类社会要重新回归到一种混乱和浑沌的状态中吗?显然,那种情形是不堪设想的。为了防止那种状况的出现,唯有寻求社会治理变革,即建立起适应社会高频流动状态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也就是全球性改革运动所应追求的基本目标。

一、流动性及其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阿明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危机凸显了出来。他说,“如果我们把危机定义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不能为制度逻辑所满足,那么当代社会显然处于危机中。人们需要充分就业,改善社会服务,并拥有社会流动的机会;而资本单边逻辑却导致了失业、贫困和边缘化。国家想独立并获得尊严;而全球资本的单边逻辑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政府都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正是这种合法性使之能够按照大众阶层的利益要求对社会关系的调增进行干预,并在国际社会维护其国家利益。”^{[1]83-84}的确如此,这些现象都是根源于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的,是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一直存在着的,只不过在今天表现得尤为激烈而已,从而以危机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这决不是全球化的后果,反而是全球化所面对的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危机,只意味着旧世界以及旧秩序已经超出了其合理性的界限,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消除,而且也只有在全球化运动的深化中,才能得到解决。

就人而言,也许自古就渴望着流动,但是,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由于土地的束缚而使人放弃了流动的念头,随着人对土地依赖程度的下降,渴望流动的热情却又被重新点燃。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首先是反映在人的流动上的,表现为人们离开了千年耕种的土地而流向了城市。正是这一波人的流动,掀起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奠定了现代社会得以建构的各项基础。可见,人的流动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农业社会出现之前,频繁的、成规模的人口流动曾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人口流动和迁徙的节奏变得缓慢了的时候,人类也就进入了农业化的进程,最后,人的定居也就意味着农业社会完全确立了起来。可是,到了农业社会的后期,人的流动又开始活跃了起来,所带来的却不是游牧生活的重新开张,反而把人类推向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在近代社会早期,这种人的流动的历史现象的重演,只是在某些特征上表现出了回归的性状,实际上,人类是走在进步的征程上的,从来也无暇回眸流连。所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的流动与前农业社会时期的人的流动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在前农业社会时期,人的流动并不表现为个体的流动,而是一个氏族或部落整体上的流动,所改变的是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而这个群体中的社会关系及其结构都没有因为流动而发生变化。

我们所考察的人的流动不是指前农业社会时期的人口迁徙,或者说,人口迁徙并不是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就像游牧部落虽然随时迁移却不存在社会流动一样。一般说来,在任何存在着等级的社会中都不存在社会流动。人口迁徙了,等级关系没有打破,就称不上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不是指人在地理位置上的改变,而是社会位置的变化。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游牧部落与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都表现为人的流动,但两者的实质是不同的,游牧部落的流动是不自由的流动,是逐水草而居;而工业社会的流动是自由的流动,工人自由到一无所有无牵无挂地随意迁移,甚至资本家四处周游去寻找投资机遇时也不是背着钱袋。社会的流动性是与这个社会的发展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时,社会流动性的程度也就处于较高的水平。因为社会发展的速度意味着人的机遇的增加,在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中,似乎每个人都有着多种机遇,当这些机遇可以向个人发展转化时,也就表现为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状况。

回顾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不仅使大量人口流入城市,而且使原先的城市居民属性发生了改变。比如,一间开设在居民区的店铺,老板的儿子可能不再愿意像其父亲那样终其一

生小本经营，在父亲无力再在店铺中主持营业的时候，儿子将店铺转给他人，而他自己则从事买空卖空的期货交易。虽然他每天都依然在小区中进进出出，但对这个居民区的老住户而言，他因为与他父亲完全不同而变得陌生，成为一个陌生人。其实，熟人向陌生人的转化有无限多条路径，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一种整体性转化，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性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的内涵。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文化开始生成，新的规则体系被制定了出来，从而充分地发挥着既联系又隔离人们的社会整合功能。熟人社会是不具有流动性的，它的一切都似乎是非常稳定的，而陌生人社会则是流动的社会，或者说，人们因为流动而变得陌生，并使整个社会表现为陌生人社会。

社会的流动性对身份造成了冲击，或者说，流动性造成了身份识别的困难，即便可以通过身份证件等解决身份识别的问题，而身份承认的强弱却不是与身份识别必然相对应的。所以，就身份作为社会化存在的人的先验条件或先验规定性而言，不仅受到流动性的冲击，而且对于迅速流动中的人来说，也失去了意义。对于流动中的人来说，他的标识是包含在他的行动之中的，他人对他的认识和承认，都取决于他的行动，视他在行动中的角色扮演状况而定。这就是为什么角色会替代身份而成为人的标识的原因。我们知道，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是较为讲究社会地位的，这是传统观念在现实中的表现。严格说来，社会地位是等级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工业社会的物化，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由于工业社会依然保留了让社会地位继续存在下去的土壤。就社会的运行而言，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都还比较低，社会的流动性也因此而显得不足，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能够形成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社会地位会变得不确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在既有的资源支撑下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一个人是否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重，往往取决于其即时表现，或者在具体领域、具体方面的能力和贡献。所以，在流动性增强的社会中，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所观察到的事实是，社会地位越来越失去了在政治的、社会的行为以及影响力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就实践而言，人们也无法再持有谋求某种社会地位的追求，因为，社会地位将会成为某种幻影，对它的追求已经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了。

根据阿明的体会，随着全球化运动中人的流动性的增强，种族间的边界将会消失，种族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种族问题会被某种行动取代，这种行动可以概括为：尊重多样性并统一起来。尊重多样性意味着抛弃空洞的强权说教。强权通常假装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内在化，假装代表‘国家利益’（强权经常背叛国家利益）。尊重多样性就要接受社会现实……对多样性的认可并不意味着无限分裂……相反，多样性应该是号召统一的起点。这是有利于民众力量发展的唯一途径。”^{[1]68-69}我们不同意阿明所倡导的所谓“统一”，我们认为，他所说的“统一”显然是工业社会“同一性”的另一种表述，代表了一种陈旧的观念，而且，在全球化所造就的多样性的世界中，“统一”本身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词。尽管如此，阿明对“尊重多样性”的强调是正确的。因此，人的流动、种族边界的消失必然会使差异扩大化和更加普遍化，多样性将不限于宏大体系和巨型人群的多样性，而是微观单元意义上的多样性。在此条件下，唯有承认差异和尊重多样性，才能打破一切将人们隔离开来的围墙，才能将人们带入广泛的合作行动之中。

就社会治理而言，如果我们希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评价社会治理的状况，那么，一条最为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促进社会的流动性。能够促进人、物、财富流动的社会治理措施是积极的和反映了时代要求的措施，相反，就是消极的。正如水的流动会激起泡沫，但那是冲刷污浊之物而激起的泡沫，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水流激起的泡沫而让水静止下来，那么，水就会变成腐臭的死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以往在社会发展中积淀下来的许多消极因素都需要在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中去加以解决，

如果社会治理抵制、控制甚至试图消除社会的流动性,无异于让那些旧的消极的因素变为腐蚀社会的因素。比如,社会的不平等、财富占有的不均衡如果不是通过社会的流动性去加以解决的话,就会愈演愈烈,直至导致社会不可承受的后果。当然,在感性的意义上,每一个政府都会将社会的流动性解读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特别是那些有着集权传统和控制追求较为强烈的政府,总会极力抵制社会的流动性,以求获得社会稳定的暂时假象。事实上,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做法,是拒绝按照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客观要求行事的做法。结果,必然会使其治下的社会失去活力,丧失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二、反思工业社会及其社会治理

在整个工业社会,“目的民主的原则为有机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共享价值的途径,并且确保它们相对于社群生活的优越性。通过扩展政治选择的范围,它们将政治变成了日常生活中最为主要的活动,每个普通人的骄傲与希望以及他的爱与其智力的结合。与此同时,它促进了共同目标的发展与对它们的阐明,它为克服支配做出了贡献。它是在一个间接的意味上,也即是通过削弱天赋对权力分配的重要性来这样做的。通过帮助创设一种情形,在这个情形之中所有等级制都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为一种政治选择而非技术性的指定,它也是以一种一般性的方式而这样做的。通过对支配的削弱,共享价值可能会变成人类种群性更为可靠的标记。”^[2]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种群稳定的条件下,民主的效应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积极状况,共识以及共享目标的形成,也可以使社会治理表现出更多自治的内涵,而且会显得较为经济。也就是说,在流动性较弱的情况下,在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以及行动中,可以忽略流动性的因素,或者,可以通过建构起稳定的制度而实现对流动性因素的控制。在这一思路中,民主和法治就是最佳选择。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在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而使得人的种群处在随机变动之中时,对民主效应的任何一种上述预期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民主恰恰不是服务于谋求共识和形成共享目标的需要,而是辩明差异而以便开展合作的基本途径。这将是根本不同于近代以来形式民主的民主,我们将其称作为实质民主。

对于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特征,从产业的角度,我们将其称为“工业社会”,在经济体制以及经济运行驱动力的角度,我们通常使用的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确,在这一社会中,人们更多地把视线投注到了商品上或商品的消费方面。当人们把视线投注到商品上,就需要回答与商品生产和交换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从斯密到李嘉图,给予我们的就是这样—个视角,建构起来的就是这样—种政治经济学。因而,我们看到劳动概念的引入,商品价值的发现并成为交换的基础。然而,一旦人们把视线投注到消费方面,一种商品的消费如果不具有独占性的话,也就是可供多人同时以同样的质量消费的,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不是由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的数量决定的。比如,服务业的兴起,特别是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服务,其价值取决于点击率。再以金融产品为例,它的价值来源于流动性,作为产品,金融业中的一项服务如果表现出呆滞的状况,其价值就是极小的;相反,如果呈现出活跃的流动性,其价值就得到了迅速提升。通过这一考察,就可以发现,当人们把视线投注在商品上的时候,在观念中所形成的是弱流动性的实体,或实体性存在(商品)的可控制的、线性的产生过程;当人们把视线投注到了消费方面,作为实体性存在的商品似乎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非实体性的商品,是无法确定边界的和具有包容无限多消费者能力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不确定性只有在流动性的视野中来加以把握。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的边界处，人们所占有的诸多社会性的物品以及从自然资源转化而来的社会物品，都是被作为财富来看待的，财富不仅可以得到法的保证而被占有，还可以进入交换过程，而工业社会也基本上被建构成了一个交换体系。根据福柯的观察，“在交换体系中，在允许财富的每个部分都去指称其他部分或被其他部分指称的相互作用中，价值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是联结力，是分析、归因和剪切的原则……价值在同一个操作中把两种功能联合在一起，一种是允许一个符号归因于另一个符号、一个表象归因于另一个表象，另一种是允许构成表象总体性的要素或分解这些表象的符号得到明确表达。”^{[3]268}物品之所以能够被作为财富来看待，就在于它包含着价值；或者，能够引起人们的价值联想，即是有价值的。也许某些物品原本没有价值，但社会活动可以促使它生成价值和赋予他价值，而且，一旦一个物品进入交换过程，或者在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应用、珍视等，也总能成功地实现价值化。就此而言，是不同于那种作为劳动量凝结的静态价值的，而是与人的观念、意识的流动密度联系在一起的动态过程。当然，无论价值以什么形态出现，一旦与财富联系在一起，就会在财富的交换过程中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而存在，也总会在交换的过程中被表象出来。比如一件文物，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估定其价值，一般说来，放在某个拍卖会上，通过几轮竞价而以某个价格成交，这个时候，其价值也得以表征，它的成交价格也被确认为它大致拥有的价值。也就是说，物品还是那件物品，而价值却在通过价格来加以表现时而处于流动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得以社会化的物品都是可以用符号来指代的，而符号既可以与物品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脱离物品而独立地运行。特别是当符号能够脱离物品而独立运行的时候，便不受物品实体性存在形态的束缚，而是显得更加自由。因而，其流动性也得到了大幅增强。

在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人口的运动的走向与货币背道而驰；货币是从繁荣的国家流向价格低的地区的；而人则是被较高的薪水、因而被拥有充裕货币的国家所吸引。因此，穷国家有居民减少的趋向；穷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会恶化，贫苦就增加了。相反，在富裕的国家，劳动力的汇聚能开发新的财富，财富的买卖成比例地增加了流通着的金属货币的数量。”^{[3]248-249}结果，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在边缘国家中，贫富两极分化尤其突出，社会治理的功能也就主要体现在极力维护社会的稳定。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作法往往是限制社会流动，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去阻碍人们在空间上的流动。同时，也使社阶层固化，以至于人们在不同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各条道路都被封死。处在中心地带的国家则处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它希望促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动，以便通过这些途径去掠夺边缘国家的财富；另一方面，它又畏惧移民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对难民，往往采取极其不人道的措施。同时，对于边缘国家输入的廉价商品，也往往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所以，阿明指出，“资本主义所制造的两极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缺乏人道，并会急速膨胀。面对这个暴行的挑战，社会主义有责任提出一个全球化替代方案，也就是可获得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并赋予它人道的、世界主义特点的方法。”^{[1]67}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看，全球化对于边缘地区和边缘国家而言，都是一种机遇。阿明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希望维持现状，或多或少地使之屈服于资本单方向流动的可能。”^{[1]67}但是，就全球化是一场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运动而言，肯定包含着某种突破资本运行逻辑和控制能力的力量，从而使维持现状的做法以及按照既有的逻辑所作出的安排变得不再可能。全球化所呼唤出来的流动性必然会不断地冲刷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使当今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发生动摇，直至崩塌。单从近些年来国际关系的状况看，由霸权国家所控制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急速流动的几乎

所有因素都对全球治理形成挑战,而且也使民族国家内的风险度大大地提高,对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全球化把国内与国际联为一体,国内的或地区性的动荡对世界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过来,国际上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有可能对一国内部的治理形成巨大的压力。不仅人与物的流动对社会治理形成挑战,而且信息的流动也可能在瞬间引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福克斯和米勒指出,“一旦‘官僚制’和‘制度’被认为是物化的,就是说,一旦我们承认偶然的人类行为被错误地客观化为不可改变的自然力,那么,诸代理机构、官僚制以及与这些公民机制不同的东西之间顽固的边界线就具有渗透性。”^[4]其实,正是流动性的增强,致使我们一切指向未来的实践进程,都出现了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状况,可以相信,它最终将使所有客观化或物化的边界都被取消。在流动性迅速增强的条件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居留地都是暂时的,不会在居留地营造出属于他(它)自己的场,无法在行动中得到场的支持,也同样不会有一个制约着他(它)的行动的场。因而,这种行动是独立自主的,体现了自由意志。同时,我们又看到,在从流动性的视角中,时间和空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虽然根据动态的观点,资源的意义变得很弱了,但一切行动都需要得到相应的资源支持又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可是,流动性使原先那些开展社会活动所必需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失去价值,而新的社资源是什么?又无法确定。

就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来看,经历过“三权分立”到“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过程,当行政被推到了社会治理的前沿地带后,建立起了文官制度,并确立起了“功绩制原则”。根据“功绩制”原则而作出的组织设计为组织成员划定了一个确定性的晋升路径。当然,为了更有效地激励出组织成员的预期,肯定会留下一个不确定性空间,以激发组织成员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社会流动性的妥协,即为了适应流动性而在组织体系中保留一个不确定性的空间。不过,我们也看到,如果这种不确定性超出了组织领导的控制范围的话,就会引发相反的效果。所以,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中,驾驭组织都需要相应的领导艺术。就既有的组织来看,基本上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环境下建构起来的,在组织设计中安排一定的不确定性空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赋予组织以活力。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环境以及组织自身的不确定性都是一种常态现象,不仅任何安排不确定性空间的做法都不再可能,而且,所有的不确定性问题都无法在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中得到驾驭。因而,组织领导者希望利用不确定性去增强自己的权力的做法会变得非常危险,而且,领导者与其他组织成员的权力关系本身就处于流动的过程中,会随时发生变化。总之,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任何集权的追求都失去了基础,虽然会在组织承担具体的任务中形成权力关系,但那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权力关系,是处在流动状态中的。

三、通过建构合作制组织刷新社会治理

关于流动性对社会治理的挑战可以说不胜枚举,我们认为,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和无处不在的。那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而我们所使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则是在工业社会中建构起来的,它无法适应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治理的要求,甚至是与这个时代中一切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相冲突的。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工业社会赖以开展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有效的行动,反而是因为行动迟缓而总是错失作出正确行动的时机。可以认为,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活动和社会治理任务的官僚制组织是一个机械

体系，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的流动性是较弱的，也就是说，社会处于低速运动的状态中，这一组织形式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能够作出优异表现。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即社会进入高速运动的状态时，这一组织形式处处表现出了回应性不足的状况。比如，官僚制组织是把效率追求放在首位的，然而，在复杂性的和高速流动的场境中，就如法默尔所指出的，“效率这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不仅仅是没有效率。当在规范的意义上将它阐释为一种管理方法时，它就是粗暴的，是可能误导的，当不按规范意义阐释它时……它便是没有意义的统计资料。”^[5]因而，需要通过组织形式的变革去谋求社会治理的改进。事实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需要用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替代官僚制组织。

就当前的社会而言，流动性的迅速增强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使得人与物在得到了信息技术的支持时进入了高速流动的状态。从此角度去观察官僚制组织，就会看到，官僚制组织虽然也非常注重信息的应用，但它的效率追求以及行动的有效性是根源于组织的结构以及制度的，信息只有被放置在了组织结构和制度之中时，才能达成合目的性的效果。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官僚制组织的结构和制度都无法容纳和驾驭信息的流动了，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官僚制组织控制信息流动的追求总是遭遇一种非常尴尬的收场。这就是芳汀所看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包含着“一种潜质，可以影响组织内或者跨组织的协调、生产和决策过程。理论上，尤其在‘官僚机器’的理论框架中，信息技术通过对协调和信息施加影响，可以使广泛层面的效率变得可行。信息技术的进步对官僚机构产生的一个主要的潜在影响是构造信息处理和信息流动的能力，这种构建是通过互联网而实现的，而非通过对角色、组织关系和运行程序进行严格的界定而完成的。但是，在实践中，效率和有效性的增长主要依赖组织的结构和设计，而不是技术的基础设施。”^[6]这里所说的“依赖组织的结构和设计”显然是不能在维护官僚制组织的意义上进行的，而是寻求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结构和制度，即需要作出全新的设计。如果政府官员，特别是部门的领导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当他们认识到信息技术的应用并不仅仅是购买必要的设备和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而是同时对组织结构作出调整，对组织关系进行新的建构，就会迎来制度变革的结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后而开始进行这种设计的话，那么，社会流动性迅速增强的事实就是一个出发点。

工业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人们一经进入组织，其活动范围往往就被限制在了组织边界之内，即使在组织的不同岗位间流动，也是极少发生的，或者说，那只是极少数组织成员才能获得的机遇。从理论上讲，个人并不是命中注定必须在某一组织中活动的，个人在组织中不得不忍受的压抑性力量只在两种情况下才是个人无法选择的：一种情况是组织模式的单一性，个人从一个组织迁出而进入另一个组织，并不能改变他受压抑的状况；另一种情况是组织对于个人的压抑可以在个人利益实现中得到抵消。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这两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工业社会中的组织模式是单一的，同时，这种单一组织模式中的任何一个组织又必然是个人利益实现的途径。而且，工业社会中的个人利益也主要是物质利益，为了物质利益的实现，个人往往不得不忍受组织对他的压抑。全球化、后工业化必将打破这种状况，我们所说的组织模式变革，就是官僚制组织的衰落和合作制组织的兴起。随着合作制组织的出现，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都会有着更大的灵活性，从而在合作制的概念下出现了组织模式多样化的局面。另一方面，个人利益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利益成了利益范畴中的极小一部分内容，人的个人价值、尊严以及与他人、与群体的交往关系，都成了个人利益的构成因素。这样一来，个人是否加入某一组织就不再是出于单一目标的考量，个人拥有充分的选择进入还是迁出某一组织的自由。这就迫

使组织必须能够满足其成员全面的、完整的利益要求。反过来,由于个人有了更多的进入和迁出组织的自由,也造成了不是组织选择个人作为它的成员,而是个人选择组织作为他参与共同体生活的途径,个人的选择在他成为组织成员之前和之后都维持着与组织以及其组织成员之间的自愿合作关系。正是组织与个人的这种选择性的互动,悄悄地改变了组织的性质,使组织这种社会存在物适应后工业社会共同体生活的需要。

合作制组织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组织,它的开放性使得组织成员在组织内外的流动变得更加方便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具体的组织的存在都是短命的,相反,正是因为这种开放性而使组织在总体上具有更强的持存意义上的稳定性。这不是因为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而把一切差异都排除在了组织之外,从而使组织成为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而是因为这种开放性更能够增强组织成员的共识,更能够让组织成员学会包容差异,更能够生成合作的组织意识形态,更能够把组织愿景转化为个人的行动指南。当然,合作制组织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文化,但它在行动的过程中所排斥的是不利于合作的因素,会让那些不能合作、不愿合作的人流动出组织。所以,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不仅不会导致组织成员的流失而使组织陷于解体,反而在组织成员流入流出的过程中淬化而成为强有力的行动系统。毫无疑问,具体的某个组织可能会是短命的,那只能是因为它不具有合作制组织应有的基本属性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无损于其他组织的存在,反而使其他组织从它的解体中获得了更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总的说来,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的状况。因为,如果某一组织不能提供良好的内部合作环境,或者,如果它在社会合作体系中的角色价值不甚重要,组织成员就会在开放性的通道中流动出组织。当组织成员的流失达到某一临界点的时候,它承担社会职能的能力也就下降到极低的水平,因而意味着组织生命的终止。一般情况下,总是因为出现了替代它承担社会职能的另一组织,它的生命力才终止。这时,它可能被归并到它的替代组织之中,在拥有更优的内部合作环境的组织中被整合和同化。

合作制组织追求的是一个广泛开放的社会性合作,这一点根本不同于以往组织中的合作。在以往一切形式的组织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为,但这些合作都是局部性的和有限的合作利益实现途径。因为,“固定群体内稳定的内部道德往往同对外采取敌意及对群体外个体进行压迫相伴而生。”^{[7]601-602}“如果人们渴望一个没有流动性和匿名性的社会,那么就必须接受封闭社会的情形,合作利益将只局部存在,而它会产生在群体界限外优先考虑权力利益的激励。”^{[7]601}合作社会显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合作社会通过合作制组织这种形式所要实现的是整个社会所要获得的普遍的合作利益,在合作利益的动态实现的累积性过程中,它又是无限的。

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也使组织成员间的平等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从官僚制组织来看,不平等的层级设置正是根源于结构的固化,当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组织结构的固化变得不再可能时,即使组织成员间出现了不平等的关系,也只会在一时一事中表现出来,而且是在有益于合作行动的情况下才会为组织成员默认和接受的。一旦合作行动的一项任务完成后,那种暂时出现的不平等关系也就消解了。也就是说,在此项行动中,你因为拥有了与任务相关的知识、智慧或技能而获得了指挥权,而在承担另一项任务时,我或他也许就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获得指挥权。总之,权力不会因组织结构的固化等原因而稳定地与某个(些)组织成员联系在一起。所以,虽然在一时一事表现出了某种组织成员间的不平等关系,而就合作制组织的整体运行而言,或者在多次执行任务的综合衡量中,则不存在所谓平等的问题。

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对于保持创新成果不受误判的挫伤是有益的。因为，合作制组织边界的自由开放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组织，可以选择做这个组织或那个组织的成员。当某个人取得一项创新成果在这一组织中未能得到承认时，他为了寻求对他的创新成果的承认，就可以离开这一组织而流动到另一组织。在另一组织中，他找到了知音，他的创新成果得到了承认，并付诸于实施和转化为行动，从而有益于社会。对此，人们可能会理解成个人寻求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它对于社会则是有益的，它保证了所有具有正向价值的创新成果都不会因为某个（些）人的忽视而湮灭。一项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得不到应用，从个人的角度看，创新者可以认定为受到了某些方面的损失，而他的同事、领导等也可能受益于他所遭受的损失，所以，如果不就某个具体的人而言，是无所谓得失的。然而，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创新成果被雪葬了起来，都是确定无疑的损失。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保证了创新成果在某一组织中受到忽视、漠视的情况下而顺利地转为另一组织所有，对社会来说，总是有益的。

合作制组织的流动性决定了信息沟通和传递都不会出现阻滞、截留或修改，因为，结构的流动性意味着信息来源并不是单通道的，而是多元的甚至全方位的，像官僚制组织中那种希望通过控制信息而获得和增强权力的状况将不再会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合作制组织一般不会建立正规的归属于组织的信息系统，合作制组织的信息支持因素主要是由专业化的外部组织提供的，是组织间合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和一项内容。专业化的信息处理组织会通过一切需要其信息服务的行动系统（组织）的密切合作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任何一个行动系统（组织）也都可以在提供信息服务的众多专业化的信息组织间作出选择。结果，信息不再与权力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因而，通过垄断信息去获取权力的行为也就不再发生。

流动性根源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社会推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无论是开展社会活动还是从事社会治理，摆在行动者面前的都是任务的多变性和岗位的流动性，从而迫使人们（组织成员）必须把学习放在突出位置上。而且，与对具体技能的学习和训练相比，对基础性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更显重要。因为，人的能力和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学习和掌握所有的技能，而是需要通过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去提升迅速接受某种特殊技能的能力，以便在承担具体任务时能够根据需要而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具体的技能。当然，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也使组织在承担任务时能够非常方便和高效地从社会中获得拥有相关技能的人力资源。不过，那主要是一些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技能，对于专业性要求并不很强的技能，则需要着眼于人的素质。一旦考虑到人的素质，唯有在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中才能得到提升。从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技能的专业化与技术的“傻瓜”化是同步前进的，绝大多数“傻瓜”化的技术在应用的时候，都更倾向于对使用者的素质提出要求。所以，考虑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时，首先应给予重视的是帮助人们确立学习的理念，帮助人们养成学习的习惯；其次，则应引导人们重视对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

总之，合作制组织因为开放性而具有流动性，也因为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组织而能够适应流动的社会的要求，不仅在社会治理方面，而且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都将流动性内化为组织的根本属性。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组织模式的变革应当成为优先事项，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建立起了合作制组织并实现了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也就在同等程度上刷新了社会治理。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无论是在一国内部还是在全球空间中，社会治理都陷入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困境之中，虽然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改革而谋求脱离这种困境，而且在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但是，似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

进展。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改革的重心。我们认为,既然人类社会的近代早期就开始了社会组织化的进程,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治理,都是通过组织进行的,那么,组织的变革才是改革应当优先选择的事项。因此,我们认为,走出人类当前困境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探索终结官僚制组织和建立合作制组织的行动方案。

参考文献:

- [1] 萨米尔·阿明.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 [M]. 丁开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83-84.
- [2] 昂格尔. 知识与政治 [M]. 支振峰,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385.
- [3]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268.
- [4] 查尔斯J福克斯, 休T米勒. 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前言 [M]. 楚艳红,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2.
- [5] 戴维·约翰·法默尔. 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M]. 吴琼,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69.
- [6] 芳汀. 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 [M]. 邵国松,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0.
- [7] 米歇尔·鲍曼. 道德的市场 [M]. 肖君, 黄承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601—602.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creasing Liquidity

Zhang Kangzhi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we have noticed rapid social 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creasing social liquidity, great challenges have been formed to social governance. We have been seeking adapt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from reform, but the reality of risk society and frequent crisis events shows that we haven't found the application point in reform, that is, we haven'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social liquidity, nor have we planned and designed reform program according to it. In fact, as far as reform is concerned, social liquidity is a critical joint point. We should fully consider it in social governance 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 system. If all these require the conscious arrang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considering another dimension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social organizing, the emphasis of reform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mode, that is,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to replac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liquidity; social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post-industrializatio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收稿日期: 2016-08-20; 责任编辑: 朱世龙, 沈秀)